

東亞金融危機對 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蕭全政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東亞金融危機對 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蕭全政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1999

作者簡介

蕭全政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公共政策分析博士，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東南亞研究所所長、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教授。

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作 者：蕭全政

出 版：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84-86 號
崇正大廈 9 字樓

◆電話：(852) 25749882

◆傳真：(852) 28347749

版 次：一九九九年二月第一版

印 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國際書號：962-8479-05-9

定 價：港幣 20 元 ◆ 臺幣 8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蕭全政

緒論

自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銖正式貶值 18% 以來，金融危機就像傳染病一樣，在半年內擴及整個東亞地區，甚至因而被稱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ontagion）。在同年七月，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分別繼泰國之後受到金融危機的波及；九月台灣，十月中國大陸與香港，十一月南韓與日本，都先後受到金融危機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金融危機，除幣值波動外，又同時帶來股票市場與其他總體經濟領域的震盪。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所受到的影響，仍然算是相對地輕微。

從個體層次看，作為價值儲藏或價值交換工具的貨幣，必然左右人們的經濟行為和一般性的社經互動關係；而從總體層次看，一個國家貨幣幣值的高低，大致上反映其經濟力的相對強弱，而且決定其國內各總體經濟領域間，以及此等領域與相關國際政經領域間的關係。因此，一個國家任何幣值上的激烈變動，必然在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上帶來相應的

顯著影響，尤其可能導致社會與經濟上的騷動或混亂，甚至衝擊政權的穩定或更迭。

而就國際層次看，透過當代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的複雜糾纏網絡關係，任何國家的幣值激烈變動，勢必影響其他國家或組織在經貿、投資、貸款等方面的利害得失及變化。就東亞金融危機而言，各相關國家與國際組織，緣於不同的利害得失考慮，而有不同的態度和應變措施，從而對於東亞金融危機的救援方案，亦有不同的做法和參與程度，甚至因而促成相關國家間政經關係的改變。

一年多以來，傳染性的東亞金融危機的確為受害國家帶來國內的各種混亂，而且改變相關國家間的政經關係；前者基本上是循著經濟及社會因素的分野而進行，而後者卻是依照各國的安全戰略而發生。然而在後冷戰時代，兩種情況卻同時可能影響區域的穩定與安全。

本文的主旨，在於分析東亞金融危機對於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為分析此影響，本文第二節將先討論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與性質，第三節則在說明後冷戰時代亞太區域安全的特質與結構，第四節將評估東亞金融危機對於區域安全的影響，而第五節則是簡單的結論。

東亞金融危機

基於有機可乘的判斷，一九九七年五月，國際市場上的貨幣投機者開始猛烈攻擊泰銖。七月二日，泰國政府放棄保衛泰銖的措施，而大幅貶值 18%；短期之內，金融危機即傳遍東南亞。七月二日之後，貨幣投機者轉向菲律賓；七月十一日棄守之前，菲律賓政府已花了數十億美元搶救披索。緊

接著，馬來西亞中央銀行在七月十四日放棄努力之前，亦曾將利率調高 50%，而且花費數十億美元；在七月結束之前，新加坡與印尼亦無法豁免於金融風暴的襲擊。九月之後，金融風暴的烈火延燒至台灣，而且十月之後擴及中國大陸與香港。為維持港幣釘住美元的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曾在十月二十四日提升短期貼現利率至 300%，引起股票市場的大幅震盪，而且影響華爾街及世界其他金融市場的波動；十一月，南韓與日本亦連帶地深受影響。如表一所示，在將近一年之內，東亞各國的貨幣幣值及股價指數都深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其中，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南韓的貶值幅度，都在 31.8% 與 35.8% 之間，而印尼更達到 77.5%。在股價指數上，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外，各國的下降幅度都超過 20%；其中，香港、新加坡、泰國、印尼等，都在 31.9% 與 39.3% 之間，而馬來西亞與南韓，更在 47.0% 與 55.5% 之間。

在開放的經濟體系中，一國政府企圖以利率政策或其他貨幣政策彌平金融上的波動，經常促使其股價指數和幣值呈現反方向的變動。以香港為例，當其政府嘗試以高利率政策護住港幣幣值以維持釘住美元的政策時，整個金融危機的影響似乎即全部轉移且集中於股價指數的變動上。此影響的集中效果，甚至使香港股價指數的下跌幅度遠大於東亞金融危機中五個受害最深者之二的菲律賓與泰國。此事實亦提醒我們，必須綜合考慮兩種指標才能妥當評估金融危機的影響。根據此綜合指標，表一最後一行顯示，在東亞金融危機中受害最深的五個國家，依次是印尼、南韓、馬來西亞、泰國與菲律賓。

4 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表一：東亞主要國家的幣值和股價指數的變動

	貨幣幣值			股價			總變化 (1) + (2)
	每一美元兌換價		變化 % (1)	指數		變化 % (2)	
	6月30日 1997	5月25日 1998		6月30日 1997	5月25日 1998		
中國大陸	8.29*	8.28 [#]	0.1	1,336.28*	1,194.10 [#]	-10.6	-10.5
台灣	27.81	33.67	-17.4	9,030.28	8,314.09	-7.9	-25.3
香港	7.75	7.75	0.0	15,196.79	9,544.53	-37.2	-37.2
日本	114.30	137.14	-16.7	20,604.96	15,783.12	-23.4	-40.1
新加坡	1.43	1.65	-13.1	1,987.95	1,314.64	-33.9	-47.0
菲律賓	26.38	38.66	-31.8	2,809.21	2,124.48	-24.4	-56.2
泰國	25.88	39.21	-34.0	527.28	358.90	-31.9	-65.9
馬來西亞	2.53	3.82	-34.0	1,077.30	570.55	-47.0	-81.0
南韓	887.90	1,384.00	-35.8	745.40	331.90	-55.5	-91.3
印尼	2,431.60	10,800.00	-77.5	724.55	439.55	-39.3	-116.8

註： * 1997 年 6 月 20 日，而不是 1997 年 6 月 30 日。

1997 年 12 月 31 日，而不是 1998 年 5 月 25 日。

資料來源：1. 李高朝，〈金融風暴後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1998，頁 1。

2. 國科會，〈背景資料〉，1998，頁 2。

除了同時表示經濟體質的不健全外，幣值貶值與股價指數下跌可能帶來完全不同的經濟效果。當貨幣貶值可能有利於出口卻也可能加速資金外流和通貨膨脹時，股價指數的下跌可能吸引更多外資，卻也可能促使人們財富大量縮水而降低消費。然而，無論是貨幣貶值或股價指數下跌，都會造成國家財富和經濟機會的再分配，也會導致相關社會關係的改

變。因此，不管是就總體層次或個體層次而言，這類的經濟動盪，通常都會伴隨著社會性的騷動。

東亞金融危機所以發生的原因，整體而言，非常多元而且複雜。從外在因素上看，正如 Leif R. Rosenberger 強調的，相關各國的大量外債與長期經常帳的貿易逆差固然是原因，人民幣的大幅（33% 左右）貶值、美元升值與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排斥性功能亦是因素；從內在層面上看，政府的錯誤政策、不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出口導向發展策略所隱含的政商關係等，亦是關鍵性因素（Rosenberger, 1997）。然而，無論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是甚麼，各國所遭遇問題的相似性與嚴重性，卻使任何期待於短期內即能有效解決此等金融危機的辦法，幾乎不可能存在。暫且不論此等危機的嚴重程度，這些國家都同樣面臨大量的貿易逆差、外債、銀行呆帳，而且其領導性的製造業部門都已癱瘓；若要短期內恢復它們的經濟活力，除須整頓內部政經秩序外，還須從外部得到大量以資金或市場為形式的資源。在外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類的資源汲取顯然將隱含激烈的競爭，而可能誘發各國間例如惡性貨幣貶值競賽的局面。

後冷戰時代的亞太區域安全

冷戰結束後，全球的政經生態出現劇烈的變化。意識形態的對抗和政治與軍事的對峙，已由經濟合作和安全諮商所取代；東西的對抗與南北的衝突，亦逐漸消融於依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而重新排列組合的國際政經關係中。雖說聯合國的重要性不斷被強調，而且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也已開始運作，但是兩者所代表世界一體的全球主義，似乎仍抵不上以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三者為中心而發展的區域主義，雖然三者之間及其內部亦的確分別展現全球主義所代表世界一體的經濟合作與安全諮商。冷戰時代，東亞地區除少數東協國家外，是典型被東西對抗所一分為二的地區；在此期間，由於衝突強度的不同，所有可能涉及區域內國與國之間衝突的主權、領土紛爭，或國家內部的種族、宗教、語言、權力分配或社經差異等之衝突，均大致上被國際層次的東西對抗所壓制。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東西對抗的鬆解，東亞地區各國之內或各國之間，所有過去被壓制的紛爭與衝突均一一浮上檯面，尤其一九九二年後美蘇撤出東南亞駐軍所遺留的「權力真空」，更引起區域列強爭霸的企圖和小國圖謀自衛的戒心，以致於後冷戰時代潮流的經濟合作和安全諮商，的確因為 APEC、CSCAP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及 ARF (ASEAN Regional Forum) 的發展而在區域內有所進展，但是各國相互間的經濟競逐及以軍事現代化為理由的軍備競賽，確實也諷刺性地因為冷戰的結束而有強化的趨勢。正如同區域主義所展現的一樣，各國之間的軍、經競爭，事實上亦循著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特質與切線而展開。

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角度看，擁有不同戰略或軍經地理位置，以及不同國際經濟分工角色的國家，必然具有不同的生存與發展策略。而從區域整體的角度看，東亞地區正是海洋世界與大陸世界交鋒而且重疊的地區。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海洋世界和大陸世界列強即分別根據 Alfred T. Mahan

的「海權論」(Sea Power)和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的「心臟地帶說」(Heartland)，而發展它們的世界霸權，並且在東亞海陸邊緣上交會；冷戰時代東西對抗的陣線，在東亞地區，亦是根據此地緣政治的特色，並以海陸邊緣的分界而展開。冷戰結束後，特別是東歐自由化和蘇聯瓦解之後，當中國大陸變成殘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而且是能代表區內大陸世界的唯一國家時，美日所代表的海洋強權，即企圖回復地緣政治性的戰略部署，而特別突顯「中國威脅論」和「和平演變」。

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當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同時加入 APEC，美國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 即提出一個「扇形」(fan-spread) 戰略模型，以解釋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政策 (Baker, 1991)。在貝克的論證中，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由美國及其盟邦所締結的以雙邊軍事條約為基礎的安全體系，將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三根骨幹。

政治民主化涉及人權的保障和公民參政權的體現，必然將促使威權或極權政體解構或轉型；而經濟自由化涉及經濟的市場化和政府干預角色的下降，正如 APEC 所主張者一樣。在「扇形」安全體系中，美國強調以其分別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和澳洲間的雙邊軍事盟約各為「一根扇骨」，而美國控制「扇底」，以致於構成「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部署。「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部署看來像是對中國大陸的另一種圍堵，加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海洋強權顯然有其完整的和平演變藍圖和行動。當然，這種圍堵的特性與冷戰時代不同，而旨在防止對於區域安全或穩定之威脅的擴大，故有人稱為「軟圍堵」(soft containment)，也有人稱為「建設性接觸」(constructive engagement)。另一方

面，海洋強權對於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強調，亦對所有東協國家產生壓力，儘管它們較能接受「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部署。

面對海洋世界的和平演變，中國大陸很有技巧地提出其以加強改革和開放為主軸的「反和平演變」策略。在以提升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目標下，中國大陸一方面加強對外開放以吸納海洋世界的「和平演變」所帶來的經濟資源和經濟機會，另一方面則加強內部改革以鞏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體，並對抗「和平演變」的政經壓力；其中，意識形態與政治控制的加強、反資本主義精神污染和加速軍事現代化等，都是強化社會主義主體所不可或缺者。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所觸動的第二波經濟改革，更是隱含且要體現上列的總體戰略。在黨軍結合的路線下，鄧小平的富國強兵政策，將經濟發展與軍事現代化緊密連結。鄧小平南巡之後，一九九二年二月，中國大陸通過其領海法，將包括南中國海的三百萬平方公里劃入其疆域範圍；而以能有效防衛此範圍為目標，中國大陸期待於二零二零年發展完成遠洋艦隊，並變成一個海洋國家。利用經濟的發展及蘇聯的解體，中國大陸在一九九二年後大量採購、引進舊蘇聯的海、空軍軍備，以發展其現代化的海、空軍武力。

對於東協國家而言，除了南中國海有關領土、主權的可能衝突外，中國大陸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與快速的經濟發展，亦隱含強勁的競爭壓力。利用絕對優勢的低工資比較利益，中國大陸可能吸乾東協同樣迫切需要的外在經濟資源和市場機會。輾轉於海洋強權與中國大陸的複雜利益網絡中，東協國家一直設法要堅持它們傳統上所宣稱的不結盟立場，而且

要培養它們做為整體的集體意識和認同。從 APEC 的成立與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爭論，到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東亞經濟會議（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區域論壇，以及東南亞十國（South East Asia 10, SEA10）等構想的倡導與推動，似乎都清楚說明東協國家在這方面的關心和努力。

在冷戰時代，東亞地區的國際政經關係與安全佈局，基本上是由超級強國所撐持的兩元化結構所決定。然而，冷戰結束後，過去被超級強國所壓制的國家內部、各國之間及區域性的矛盾與衝突，已逐漸普遍的浮現；另一方面，一些新生議題，例如環保與打擊犯罪等，亦同時變成重要的課題。這些涉及安全與穩定的多元議題和新生面向，由於種種歷史性的因素，對於東協國家而言，似乎特別重要，也難怪馬來西亞曾在 CSCAP 中提議設立一個專門討論安全合作與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概念的工作小組。

然而，就本文所涉及金融危機和區域安全的主題而言，上述大部分仍屬國內議題者的重要性，可能仍不及於「亞洲奇蹟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Krugman, 1994）或「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Huntington, 1993）等之討論。基於與貝克同樣的關心，Samuel Huntington 曾出版《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一書，以鼓勵政治民主化（Huntington, 1991），並提出「文明的衝突」論，而將美國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戰略設計提升至文化層次；Paul Krugman 也在解構「亞洲奇蹟的神話」中，批判亞洲價值及亞洲各國用以動員生產資源的威權性作法，而呼籲亞洲的「紙老虎們」（paper tigers）進行尊重市場的經濟

自由化。這些立論，正與貝克的「扇形」戰略模式並容或互補，而經常在討論美國的亞太戰略時被援引。

金融危機對區域安全的影響

基本上，雖然無法完全排除那種可能性和作用，但是像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一樣將東亞金融危機完全歸咎於西方的陰謀或惡劣的貨幣投機者，也不必然妥當。然而，假如曾經比較中國大陸和美國對於化解東亞金融危機的態度和方法，很多相關的亞洲國家和人民，似乎必然會質疑美國的動機和善意。大致上說，他們會相信中國大陸是一個及時的救難者，而美國卻是趁火打劫、混水摸魚。

當泰國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發生金融危機時，IMF 和美國都沒有任何反應；七月十八日，IMF 從「緊急救援基金」（Emergency Bailout Fund）撥款十億美元，無條件借給菲律賓。八月，泰國根據 IMF 的要求，承諾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後，得到貸款一百七十二億美元；其中，一百億美元是由 IMF 的成員國捐助，但是並不包括美國，雖然泰國曾經提出要求。十月，當 IMF 與印尼簽約並貸與三百三十億美元時，美國才捐款三十億美元；十一月，當南韓向 IMF 借得六百億美元時，美國又捐助十億美元。美國的捐助政策，似乎與其在亞洲的地緣政治戰略完全吻合；其中，泰國雖屬美國軍事盟邦，但其以中南半島老大自居而堅持緬甸（或棉馬）加入東協的政策，卻與美國的政治民主化政策完全背離。

其次，在向 IMF 借款的談判過程中，接受貸款的國家總是被要求必須進行自由化式的經濟改革。金融危機的受害國家，已深受經濟國際化和自由化之害，而 IMF 卻又堅持它們

必須進行自由化式的經濟改革；它們在無奈中接受 IMF，而後者又是主要由美國和其他西方列強所支持。此外，當金融危機在泰國爆發時，日本曾提議創設「亞洲貨幣基金會」（Asian Monetary Fund, AMF），菲律賓也利用 APEC 年會召開之前，召集一次會議，並希望在 APEC 的架構下推動 AMF 的構想。但是，在擔心促成亞洲主義的發展下，美國及其他西方列強強烈反對 AMF 的構想。不斷強調 IMF 的妥當性，美國顯然是要鞏固其亞太政策三根柱石之一的經濟自由化。然而，對於一個馬哈地式的亞洲人而言，這卻相當於混水摸魚，甚或趁火打劫，尤其是美國並不急於救援那些受難的國家；這也可能是受創排名第三的馬來西亞至今所以不向 IMF 求援的主要原因。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大陸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的表現，顯然與美國有所不同。自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二年，中國大陸才分別與印尼、新加坡建立邦交關係。一九九五年，中國大陸成為東協的對話伙伴；一九九七年二月，兩者間建立聯合合作委員會（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同年四月，在黃山會議中，東協由馬來西亞代表，邀請中國大陸參與年底東協三十週年的非正式高峰會，而中國大陸則建議雙方簽署一項改善關係的政治宣言。

一九九四年初，人民幣貶值三分之一，這的確有害於出口導向的東協諸國。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大陸曾捐助十億美元參與 IMF 對泰國的貸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東協三十週年的非正式高峰會中，中國大陸承諾「人民幣不會貶值」，而且提供四十至六十億美元參與 IMF 的紓困計劃。另外，中國大陸也在此高峰會中和東協國家簽署名為「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東協合作」的聯合聲明。由於固守人民幣

的幣值而且積極參與紓困計劃，中國大陸贏得很多的讚譽，特別是來自東協國家者。中國大陸被認為是亞洲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捍衛者，而且幾乎可以認定是東亞金融危機中最大的獲利者。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其實它也沒有太多理由或本錢貶值人民幣。基本上，它是一個快速成長而且具有相當大規模出口部門的龐大經濟體。爲了維持經濟的動態穩定，中國大陸歷來都依賴大量的外來市場和以貸款與投資爲形式的外來資源。在外來市場與外來投資間，後者因其不可替代性而顯得比前者重要，因爲國內市場的開拓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外來市場；而人民幣的貶值，儘管可以鞏固或擴張外來市場，卻極可能嚇走已到達及將來臨的外來資源。因此，只要能開拓必要的國內市場，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將可能是上上之策。

其次，爲了幫助維持港幣幣值的穩定或爲了承擔大國的責任，人民幣其實也沒有貶值的理由，何況從中國大陸國際收支的經常帳看，它已經連續多年維持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假如中國大陸真的必須要貶值人民幣，那麼它那經營效率欠佳而且三角債數額龐大的國營企業和銀行體系，也將可能遭遇大麻煩或大災難。

東亞金融危機對於亞太安全的影響，不僅見諸於因其改變各國之間或各集團之間的政經關係而影響亞太安全，也見諸於受害各國內部因爲社會動盪、經濟不安，甚或政權不穩定，而影響亞太安全。蘇哈托、金泳三和橋本龍太郎的失去政權就是典型的例子，而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不穩定政局亦不可忽略。另一方面，印尼的暴動，特別是排華的舉動，亦可能影響區域的穩定。此外，受害各國因爲金融危機而放鬆或放棄其武器更新計劃或軍事現代化，例如泰國、南

韓、馬來西亞與印尼等，更可能直接影響區域內的軍事均衡甚或亞太安全。對此而言，美國雖然可能失去部分軍火市場，卻可能因而增強其在亞太的軍事影響力。

結論

東亞金融危機本質上應該屬於經濟性的事物，但是在某些層面上卻也會影響亞太安全。從國內層次看，它們會沿著社會經濟關係和政治反對運動的切線，帶來即時的社會不安、經濟波動和政治衝突，進而可能影響區域內的安全或穩定。從國際政治看，它們更可能促成區域內各國、各集團或各相關組織間的聯合或衝突，因而事實上改變區域安全的景觀或結構內容。

利用東亞金融危機，美國似乎更強化其「扇形」亞太戰略的執行。因此，除了更新美日安保條約而且修訂美日防衛指針外，美國又透過 IMF 而利用金融危機，推動經濟全球主義和經濟自由化。當然，金融危機自然可以瓦解東亞的威權政體，而 IMF 貸款所附帶的經濟自由化改革措施，亦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推動，例如要求解構被扭曲的政商關係、取消政府的重商主義式干預政策等。此外，鑒於地緣政治上的考慮，美國顯然較支持其在海洋世界的盟邦，而非身處大陸世界的國家。

中國大陸很努力於穩定人民幣的幣值，但是這主要仍是為了自身而非國際社會的利益。然而，利用東亞金融危機推動「睦鄰」政策，中國大陸顯然已改善和東協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且增加其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能在金融危機中維持經濟的穩定和成長，更贏得歐盟各國和美國的興趣，

而思改善相互間的關係。但是，以美國而言，「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係」並不同於「戰略伙伴關係」，同時也須受到美國的亞太戰略及區域內海陸爭霸的基本格局制約。此外，朱鎔基上台後所主張三年內完成政府體制、國營企業和金融體系等三大改革，將可能是決定人民幣幣值是否穩定，甚至是經濟改革是否順利的關鍵。然而，無論如何，中國大陸已充分利用東亞金融危機，而在海陸爭霸中贏得更多籌碼。

持平而論，東協各國已經深受金融危機之害，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已經沒有機會恢復活力。無論如何，國際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風雲詭譎、變化莫測，對於所有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夢魘，因為它們實在沒有能力管理。就這一點而言，無論金融市場或股票市場都不應該是無辜者的屠宰場，國際社會似乎必須設法尋求改善之道，否則只會如這次的東亞金融危機一樣，連日本這樣的經濟大國也不能倖免，而連 APEC，甚至連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及 IMF 等國際機構，也幾乎是無能為力。

過去數年來人們喜歡談論亞太區域內經濟和安全間的關係，尤其是喜歡強調兩者間的良性關係，例如辯稱經濟整合對於區域安全的貢獻（Zoellick, 1998）。東亞金融危機雖然不必然提供一種完全相反的見證，卻是值得我們重新反省經濟與安全間的真正關係。另一方面，在西方人眼中，東亞金融危機使「亞洲奇蹟的神話」破滅，也使亞洲的「紙老虎」現形，因而傷害亞洲人的自信與樂觀。作為亞洲人，我們又該如何檢討，而且又如何重新面對東亞金融危機後的世界呢？